

四川文史資料選輯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办编辑 聂子麒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年·成都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李永华

封面设计:邱云松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三辑)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彭州市国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1/32 印张 7.5 插页 1 字数 170 千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2718-4/K·379 印数:1-3000 册

定价:4.5 元

目 录

在国民党的四个监狱里	田一平 (1)
纪念田一平同志	楚图南 (51)
自贡和平解放简述	杨续云 (54)
忆我父亲罗文谟的政治与艺术活动	罗荣泉 (67)
解放前我在四川水利工作中的片断回忆	熊达成 (108)
历史的见证	邓汉祥 (127)
我所知道的张群	官大中 (149)
一鳞半爪忆张群	陈雁 (161)
四川军阀混战与防区制	陈书农 (183)
我任中国驻日本占领军先遣官的经历记	廖季成 (203)
川军白骨葬武陵	张登上 (215)
泸州龙舟竞渡的回顾	毛子安·赵永康 (218)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二辑刊误	(236)

在国民党的四个监狱里

田一平

编者按：田一平同志是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的老成员。他长期利用自己的多重身份和联系面广的有利条件，兢兢业业地为革命工作，为发展、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事业无私奉献。即使身陷囹圄，他也未忘记自己的职责，团结难友，争取同情者，积极同反动派巧妙周旋、斗争。1993年1月30日他在成都逝世，享年86岁。在辞世前，即1992年12月14日完成了记录他铁窗生活的《四个监狱》，以教育后代。现将原文刊载，以飨读者。

《四个监狱》之一——将军衙门

1947年2月，蒋介石勒令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办事机构撤回延安。5月9日，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又炮制了“戡乱动员令”。以加紧对爱国进步人士的血腥镇压。6月2日成都的特务导演了一幕闹剧，以便浑水摸鱼。这天，由特务装扮成老百姓裹胁一批人去新南门米店抢米。那里的秩序相当混乱。

特务张网以待。米店对面相馆里有两个青年出于好奇，架起相机正待把这一情景拍摄下来，当即就被宪兵、特务抓住。诬指他们煽动风潮，推波助澜。后来又大做文章。竟然捏造出他们是“共产党，曾去河南洛阳与共产党联系过”的罪名而将他们枪杀。我当时任《华西晚报》总经理（之前任《华西日报》的经理）。报馆里有几个青年人跑到米店附近去看热闹，我批评他们：“人家在搞圈套（这是1940年北门外抢米事件的翻版）。你们还不晓得，还要自己送进去”。我立即召集全体人员开会。对他们讲：“现在形势险恶，各种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你们愿意走的就走，不愿走的，作好一切准备，连供词都要考虑好，我是不走的，因为我是民盟的，我一走，好像我们民盟的人心虚”。

开完会，地下党员胡春浦来找我，他那时在东大街开了一个“大有”字号的五金商店作为掩护，进行革命工作。在“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内有熟人能够探得一些内幕。他说：“我得到可靠消息，特务要捕人了，这次和前几次不同。逮捕的面宽，你要隐蔽一下，到乡下去”。我点了点头，匆匆而别。我本已有到乡下去暂避一下的打算，转念间，出于党性，想到中共四川省委要我们成立文化小组的同志杨伯恺面放心不下。就到杨伯恺家里和他商量，对他说：“局势很紧。我们是不是避一下”。他坚决地说：“不走，不走，顶住。第一，张表老还在上海。如果我们出了事，张表老会讲话的。第二，1940年，特务要逮捕我，邓锡侯通过张雪岩给警备司令部写了个条子。特务未敢下手。（邓锡侯、张雪岩、杨伯恺都是四川营山人）这次如果要逮捕我，我想邓锡侯还会帮忙”。我说：“好嘛，那我们就不走”。1950年，我到北京向张表老汇报此事。老表笑着说：“那时候我自身难保，说话有什么用处”。

6月2日深夜，暑气未消，忽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使我警觉

到：特务来了。我迅速起床，刚要跨出房门，特务已破门而入。一群特务，头上包着毛巾，手持短枪，个个如狼似虎地逼着我，有一个头目吼问：“你是哪一个”？“我是田一平”。他命令我站好，不准动。开始搜我的家，楼上楼下，寝室厨房，把家里的人集中起来，挨个询问。他们从未见过这样凶恶的阵仗，不知所措。五岁半的儿子站在床上嚎淘大哭，有个特务问我：“你那个证明书在哪里？”我问“什么证明书”？他说：“就是政府准你办报的那个通知书”（即晚报的出版登记证），我说：“在柜子里”。特务找了一会儿没找着，又出房来问我：“究竟在哪里”？我趁机回房，顺手抓了一件棉袄披在身上，并把儿子田林熙抱起来。他失神地看着我，眼角挂着两行眼泪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搜查完毕。那个小头目拿出一根布带子。叫我把孩子放下，把我的两手朝后死死捆起。我的爱人喻素萱，看着这一切悲伤地流着泪。特务们把我推推搡搡地押了出来。走到华兴正街，只见满街都站着武装特务。他们把我推上吉普车。不一会儿，《华西晚报》的营业主任马天一，营业员何良臣也被抓上了车。还抓了一个工友杨祐山，车上，何良臣紧挨在我身旁。感觉他在发抖。我用手在他脚背上划了几个“不，不”。他才镇静下来，车很快开进了宪兵第五团团部——人们熟悉的将军衙门。

将军衙门，这是四川特务机构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所在地，又兼作政治犯的看守所。走进大门，只见满院的警察宪兵，强烈的灯光照射着每个角落。从右边一道小门进去是个小院子，这里就是关押犯人的地方。特务把我带到办公室，办了登记，告知我是 14 号，并且交待在监狱只准说号数，不准说名字。特务随即把我的近视眼镜取下。然后把我带进这小院子的一间牢室。此时，被捕的人不断地从小门进来，不愿进牢房的特务就用棍棒打。一时

间，惨叫声、吼叫声、棍棒声混合在一起。第二天一大早，见一青年睡在床上，显然也是才来的，我问他“你是哪一个”，他说：“田先生我认得你。我的情况过两天告诉你”。后来知道他是民盟办的荣利印刷厂的张大昌。过了一会儿，又进来一人，是《华西晚报》记者车辐。他一进来就站在窗口旁，一边朝外看，一边说：“于邦齐（于渊）来了，手朝后捆着”，“杨伯恺也来了，眼睛被蒙着。”车辐还喊了一声“马副官”。我听到喊马副官时，心里紧张了一下，原来、我家住的华兴街大享里，是国民党六十军我族叔田冠五的驻蓉办事处。马副官是办事处的副官。办事处的事我不知道。但里面有军事文件、枪支，特务们一惯捕风捉影，栽赃陷害。我担心他们会通过马副官来套我，抓住一些事栽到民盟头上来治我的罪。在逮捕我时，从军部办事处搜到两支20响的手枪。据此可以诬我私藏军火，组织暴动，把个人的事扩大为民盟的事。幸亏特务从我家搜走之后就私自打来吃起。因而也就不提枪支的事了，当晚被捕的大约有三十多人，《华西晚报》孙文石、刘慕宇、严士奇；民盟办的荣利印刷厂副经理，厂长罗启维、叶青东等都被捕了。其他人多已忘记，其中还有两个女的，一个叫兰继芬，另一个叫王克毅，是彭玉民的妻子。本来要抓彭玉民，他跑了，则抓了他的妻子，问不出什么过两天就放了，兰继芬由刘文辉保释。后来，我才知道，成都市这次大逮捕是由四川省特委会布置指挥的。省特委会主任邓锡侯圈定名单时，初不拟圈定张志和、范朴斋、田一平、杨伯恺、于邦齐。特务骨干竭力反对，说什么“这些人身份重要。已经呈报中央，若不逮捕，说不过去”。最后邓还是圈定了，但特别关照张志和、范朴斋二人（因与他相熟识）由他亲自处理，用小车送他们到东门外关在“厚生农场”。过了十多天就放了。这次被捕的全部关押在将军衙门里。

将军衙门是清政府留下的一所军营。国民党政府利用它来作特委会，关押政治犯，它已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我们住的小院四周都是高高的围墙。墙上有许多枪眼，大树上也架着机枪。从各个方向都可以扫射。小院外面有间大房，住着宪兵第五团的武装人员，一队全副武装的宪兵正在巡逻。监视着小院里的一切。小院被包围得严严实实。清风不入，阴森无光，只一道小门可以进出小院，正面是小小三间平房、砖木结构，分别是一、二、三号牢房，右侧也是平房，一排六间四、五、六、七、八、九号牢房。特务把我先投入了第四号牢室。

室内很小，放了四张单床后，就只剩很少的一点空隙，还要放一个尿桶。与我同住一室的除了张大昌、车福、还有司机陈中平和邛崃的王伯高，陈中平与王伯高挤在一床睡。王伯高曾到过延安，后派回四川做策反工作。他利用自己的地主家庭身份，参加了袍哥，联络了一些开明人士。他以操袍哥、吃鸦片烟作掩护，装成一副十分颓唐的样子，但未能躲过特务们鹰一样的眼睛，竟被从成都很有名气的袍哥大爷冷开泰家中抓来了。来时鞋子都没穿，只穿了件汗褂。但仍显得倔强，有骨气，特务们经过精心研究，把我、罗启维、孙文石、张大昌、陈中平、刘慕宇、颜士奇、张政弟八个人调到了第五号牢室，我们称之为土牢，专关死囚。这一间牢室与别的牢房不一样。不仅大一些，而且墙壁之外还加了一层土坯和石头。低矮而潮湿，伸手能摸到屋顶，灰尘和泥土亦随之掉下来。木质地板有很多洞，老鼠日夜光顾，墙上两个小小的窗口，远不足以让我们七个人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此外，还缺少用水，时值盛夏，我们这小小的陋室，异常闷热。遇着下大雨，室内就灌满了水，景况就更恶劣了。随后，我又被调到第三号牢室与杨伯恺，于邦齐、叶青东四人住在一起，大概是“特殊”待

遇吧！后来才发现叶是来监视我们的，每天我们唯一盼望的是仅有一次的10分钟放风，大家先排队进厕所，一次进去两个人，时间很紧，上厕所之后，剩余的时间可以在天井里走动走动。至于我们的囚饭，一天两顿，每人一个钵钵，菜是清水煮白菜，或咸水煮萝卜之类。没见一点油荤，经常处于饥饿的状态，生活中重重的磨难与敌人精神上的压迫。不仅没有使我们屈服，反而使我们每个人的意志经受了严格的锻炼。

虽然不能大声讲话，但我们总是借放风、打饭的机会悄悄地三言两语互通情况，交换意见，相互鼓励，我们还采取讲故事、谈工作，讲笑话等多种方式来转移视线。淡化思想上的压力，缓解目前的痛苦。我们互相激励要坚持，要有信心。比如：在室里，我们八个人，陈中平讲他开车的技术，罗启维讲他办荣利印刷厂，在办厂时上当受骗的事。刘慕宇讲他在《新华日报》里的事。我讲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在重庆双十会谈里的一些情况。还讲了上党战役的胜利。凡此种种都帮助大家渡过了那监禁的苦涩困难的日子。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大家的情绪，鼓舞了士气。

在我被捕的当晚深夜，特务刚把我带进四号牢室，一会儿，就又有特务喊：“14号，跟我走”。出了小门，向左拐进一条巷子。我想，这一定是去审讯，抬头一看，果然是审讯室，高柜子的后面座位上，坐了四个审讯的特务，此时天还未亮。他们首先问民盟的情况，那凶狠的吼叫，怒目金刚似的面孔，威威乎严如阎王殿，这就是敌人的过堂。我早有思想准备，镇静地回答：“我在民盟的情况，邓锡侯同你们的负责人都知道，我同杨伯凯、范朴斋、张松涛四个人，曾经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前往川康绥靖公署会见过邓锡侯，你们不是不知道”。随后，他们又问四川民盟基层组织的情况。我说：“我是民盟四川省委的秘书长（盟省委委员有：李璜、

宋连波、杨叔明，他们三人是青年党。还有：张志和、杨伯凯、马哲民、李相符、沈志远、我，一共九个人）。基层由基层组织掌握。我不管。”又问《华西日报》、《华西晚报》、民盟的西区、北区的组织都有哪些人”，我一一推了：“这些基层情况我都不知道”。特务很狡猾，在问我民盟情况的时候，突然插一句：“你是什么时候参加 CP 的”？我答：“没有呀”，特务说：“据我们调查，你是共产党”，我说：“你们的调查不确实”。特务也确实没有掌握到我的共产党关系的证据，对这一点也就无法深入。提了一些别的问题之后，这次审讯就结束了，回去时，从另一道门出去，我看到隔壁那间屋里有高高的杠子、木架、绳子、火炉等刑具，我猜想，让我走这道门，全部刑具展现在我眼前，意在让我明白，如不老实坦白，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此时，我也在想：从审讯我的情况分析，敌人抓我们，重点是要打击民盟以打击共产党，民盟是公开的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进步组织，只要不牵涉到共产党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因此，我决定今后狱中的策略。就是以民盟为掩护，装成一个十足的中间派。在第一次被审讯之后。又被提问过多次，讯问的方式时有变换，一般是不依形式、地点，特务想起什么问题，就喊去问一次，所提都是关于民盟的事，正如我所分析的；我始终以民盟的事作借口。凡是已公开的我就承认，就答复，凡问有关共产党的事一概答不知道。敌人还从杨伯恺、于邦齐口中打探我的情况，结果什么也没有捞到。凡被抓进来的，每个人都是被审讯了的，内容方式各不相同。大多是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张大昌，因他是民盟的联络员，特务就从联络员的角度追问他联络了哪些组织？哪些人？问不出什么就用绳子吊在梁上。于邦齐（于渊，中共党员）川军少将，经张澜介绍加入民盟，积极从事民盟的活动，是民盟北区区分部主任委员，敌人以军事法庭的方式

来审讯他，特务们身着军装。这位铮铮汉子在敌人残酷高压之下只承认是盟员，凛然不可犯。1949年12月7日，国民党大屠杀之夜，他与王伯高、杨伯恺等众多的难友惨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即是今天的成都十二桥烈士），与此同时，在北京召开的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上，因不知其已牺牲还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在审讯中与案情无关的就被放出了。

由于敌人在审讯中抓不到民盟的什么东西。于是他们就逼迫难友悔过退盟。我们则开展了不悔过、不退盟的斗争。

对我，他们就来软的，讲朋友、讲同事、或找人来试探。

一天，一个姓陈的法官来劝说我：“我们两个曾经都是川康绥靖公署的，有话好说嘛”，我说：“我嘛，是民盟的，有话好说”。二次又来说“我们两个说点秘密的话：我要调职了。你要申请退盟，由我办，快得很。我走了，就难办罗”。我不理他，转而又去游说杨伯恺，他们找了一位杨伯恺的好朋友来转达邓锡侯的话：“你只要在申请书（即退盟悔过书）上写上杨伯恺三个字，写好后秘密保藏。别人不知道”。杨伯恺对我说：“特务纠缠着我，怎么办”？我告诉他，我抱着不理的态度，他说：“好，我也这么办”。以后特务找他劝说时，他说：“我出去可以，要群众来欢迎我”。特务恨恨不已，说“杨伯恺是顽固堡垒”。难友中一些人对特务的高压、审讯，开始时有些凄凄惶惶、愁蹙不安，看到杨伯恺和我的态度，心始稍安。但是也有人动摇屈服。有一人耐不住监狱里的“寂寞”，竟然写了悔过申请书，履行了手续，登报退出了民盟。出狱后，他按照狱局的要求，还定期来汇报。他不仅自己动摇、屈服，还引诱、劝说了两人，拉他们下了水。还有个共产党员也经不住考验，对我说：“我决定出去。”我说：“你想后果哟。”他说：“我想过，决定出去。”临到他要走的时候，我站在房门口，他说：

“我要出去了，心里很难过，但我有说不出的苦衷，请你们原谅（解放后，此人给我写过信，并叫他爱人来找我谈，说他年轻，犯了错误，请组织原谅，来信我当即交予川西原党委组织部马识途同志了）。

还有，就是罗启维。特务们以为他性格软弱，容易突破，采取许多办法，拖他下水，先对他说：“你身体不好，你的妻子，两个儿子都很苦。他们希望你出去。出去后，他们的生活解决了，你的生活也解决了”。我就对罗启维说：“他们这些话都是骗你的，听不得啊”。以后特务又把罗启维的舅舅找来继续软化：“你爱人身体不好，在生病”，说了许多苦楚都未能使他动摇。

这个时候，我们牢室里还出现了一个插曲，幸而没被追究，未闹出大事来，原因是于邦齐跟叶青东吵架，几乎打起来，叶青东是个律师，曾与于邦齐在杨森下面共过事，有隔阂。现在往事重提，就闹开了。叶本来是特务利用来监视我们的，正好，他借此报复。去汇报说：“杨伯恺在狱中宣传共产主义，骂国民政府”如何如何，还上报到邓锡侯那里去了。我们就批评于邦齐太不应该。于也深感悔恨，连说：“好好好，以后坚决改”。

我们被关在牢室里，一段时间都没有得到外界的消息心里颇为着急。于是就策划争取看守和分化特务的工作，希望通过他们与外面取得联系。当时，我们已经认得几个看守，管理上，似乎也有松动。正好，我又与杨伯恺、于邦齐、叶青东调在一个牢室，这就便于我与杨伯恺商量工作了。

我和杨伯恺共事很久，相互比较了解，这次被捕前，我还特别去与他商量。我们于1940年相识，当时我任《华西晚报》经理。新任社长是罗忠信，李次平任总编辑，编辑唐尊九、罗、李、唐三人对我说：“既然社长、经理都换了，主笔照例也该换一换。有

个老主笔杨伯恺，为避免特务迫害，住在西门外土桥，可以把他找来”。于是唐尊久、李次平和我三人拿起聘书，前去邀请他作了主笔，他每天写好的稿子，先找人誊好送到报馆，避免因笔迹暴露他的行踪。这样我才知道他曾赴法国勤工俭学，是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共产党人。根据党的指示，为了进一步搞好党的统战工作，他又以个人名义加入了民主同盟。1946年，杨伯恺在《民众时报》任总经理兼主笔，聘请中共党员漆鲁鱼任总主笔（张澜任社长，经费由刘文辉提供）。有一天，漆鲁鱼把我、杨伯恺、李相符请到他的总编室，从眼镜盒中拿出一个普通的信笺，正面是几句家常话，只见他翻过来，用显药水把它显出来，原来是中共四川省委写的命令：“兹经四川省委决定，成立成都地区文化工作小组。李相符、田一平、杨伯恺为小组成员，漆鲁鱼任支书。不久，漆鲁鱼、李相符相继离开，就剩杨伯恺我们两人坚持在成都。现在狱中的斗争，当然是我们共同的斗争。非常遗憾的是，自我被转移到重庆之后，我就与杨伯恺分手，再也没有见面了！不幸，他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惨杀于十二桥，为人民革命事业英勇就义了。成都解放后，中共川西区党委在东胜街召开了各界人士座谈会，贺龙同志特别向危淑元同志祝酒，说：“杨伯恺同志牺牲了，我们很难过。伯恺同志为党作了很多工作，是个好同志。”当时，马识途和我都在那里，听到这些话，心里也很难过！

首先，我们分析了看守我们的宪兵的情况，认为：他们还是青年，多是为了职业、生活、就是有的小特务也是被骗来的，并不都是顽固分子。于是，我们发动难友，分头试着与他们接近，以多种方式进行工作。我和他们摆龙门阵，拉家常：“你们不是想进职业学校，考大学吗？”“我们多是教书的，报馆的，可以帮你复习文化嘛”“我们的熟人多，在社会上还是有活动能力的，以后还

可以多方面帮助你们”，“你们现在这个工作还不是出于不得已！”……杨伯恺就给看守们讲历史，教国文……经过不断的工作，他们对我们的态度逐渐有了转变，甚至还向我们讲心里话，宪兵小郭说：“长官讲，你们这些人坏得很，实际接触以后，才觉得你们并不坏，心眼好！”渐渐地，这个渠道通了，我们非常高兴。他们的态度变了，能帮我们与家里人联系，家里的衣物、吃食已能经常送到。甚至还悄悄夹带一些书报进来，使我们知道外面的许多情况。我们知道6月2日重庆也进行了大逮捕。邛崃县敬堂中学的一些进步教师，被抓进来了，这个中学是张志和为了纪念他的父亲而办的。因而我们把这些教师的被捕通过看守告诉了张志和，他便把他们营救出去了。我们还常常请看守帮我们买东西。我们关在那里，处境恶劣，伙食坏，而隔壁恰好有家饭馆。他们就去帮我们买来回锅肉、盐煎肉、吃得来皆大欢喜，王伯高竟然忘乎所以的边吃边赞美地说：“吃，这是成都市炒得最好的！”

不幸，这些活动被主管的特务发现了，斥责这些看守被“赤化了”，一天还把宪兵，看守和一些特务集合在天井里，当众惩罚一个姓李的看守，以警告他们不要帮我们做事。并且把原来的看守调走了。可我们正好利用这件事来向新看守说明特务的残酷、心狠、手辣、恶毒。我们仍一如以前，努力接近他们，争取他们的了解，帮他们提高认识。不久，这些新来的看守，仍然不把我们当坏人，帮我们传递消息，买东西。特别令我们感动的是八月中秋的一天。

中秋那晚，看管人员过节，他们猜拳行令，喧嚣热闹。我们当然没有份。就各自呆在牢房里，夜深了，有人在门窗下轻声喊：“杨先生、杨先生”。起身一看，是看守小郭，他手里包着几个月饼递过来，说：“你们吃”。就走了。我们刚睡下，又听见门外有人

小声地叫：“杨先生、杨先生”借着月光一看，是挨打的那个小李。他包着一个鸭子递进来，并说：“你们吃，骨头丢在原桶里。我和值班的商量好了，我代他值班。你们放心地吃，不要紧的。”听到这话语，看到这鸭子，我们一时热泪盈眶，心情万分激动。“我们的争取成功了、政治胜利了！”看到了我们前途的曙光，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10月18日，这是一个永远铭刻在心的日子。那天是星期六，管我们的鲁管理员，照例是这天下午要回家，而他却未走，在院子里转来转去，令人怀疑。晚上九至十点钟的时候，只听外面闹哄哄的。接着二三十个人冲进来，有人喊：“在3号在3号”，3号就是我住的牢房，长电筒照着我，喊道“14号，把行李收拾好”。我心里一怔，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站在窗口喊：“鲁管理员，什么事嘛”，他说：“你收拾东西，不要管”。我忙着收拾完毕，跟随他们来到了办公室，一个胖子，大家喊他漆组长，大约是个小头目，叫我走过去，他用皮带把我双手朝后捆起，然后又用布带把我双眼、口蒙起来。随后，喊了一声走，一群人齐声高喊：“抬起”，众人用手把我高高托起。有手软的，管理人员骂骂咧咧：“三天不吃饭就手生了”？这帮人“嗨哟……”地高呼着，这是旧政府衙门的规矩。杀人前的一种仪式——闹堂。这群人把我推了出来，拥上一辆三轮车，我被蒙上眼睛，虽然看不见，凭我熟悉的路径，可以感觉到行走的方向。如果出大门朝右拐出通惠门。就是去刑场。我感觉是朝左拐，朝东走，又东拐西拐了一阵，大约走了一小时。下起了毛毛细雨。沿途静寂无声，车停、敲门、内有人问口号、一问一答。门开了，我被推进一间屋子，解开了蒙我眼睛、嘴巴的布，我定睛一看，这是一间小室，一桌、一凳、一床。听到外面的人正在和重庆通电话，有电话机。自然是个机关，

我想了解这是什么机关，因此就问看守：“我要小便，行不行”？他想了一下说：“可以”。把我手上的皮带解了，我走出房门，借机四面看了一下，前后两排房子，后排房内在打麻将。有女人的声音，我猜想这可能是个特务机关，回来后见看守已睡在床上，我就在地上背靠着墙坐到天亮，我想，他们打电话到重庆，有可能把我弄到重庆。天快亮时，漆胖子来喊：“起来起来”。他说：“田先生，你我两个往日无冤，今日无仇，请你到重庆去，把一件事说清楚，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你要规矩些。不准叫唤，不准说话”。这下我明白了，是到重庆，放心了，但是为什么？又模糊不清，给我吃了早饭，叫人理了发，从院子出来，回头看，哦，原来这地方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娘娘庙街 22 号特务警站。在朝外面走的路上，漆胖子又打招呼：“田先生，不要乱说哟”。我说：“知道知道”，门口停了两辆吉普车。我和漆胖子上第一辆，抬脚上车。不禁使我大吃一惊。只见胡春浦坐在车上！这次坐牢以后，我的对敌策略是保持民盟的身份，且以盟事为搪塞其它的事概不承认，共产党的事概不牵连。可是此时此地，你所不愿牵连的人恰恰就在身旁。莫不是因同案而向重庆发落？抑或他告发我而去重庆作证？种种疑窦，一时难解，心神不安。但不能不上车了。漆胖子坐中，我和胡春浦坐两边。直视前方，不敢斜视；可心里一直在嘀咕。车子快到凤凰山机场了，胡春浦不慌不忙递向漆胖子一支烟说：“漆组长，请抽烟”。向我暗示，组长是个特务头子，接着又还说：“漆组长，我这几年身体不好，在害病。做了点小小生意，那晓得李荫枫这个狗日的乱说我一些，事情的来由我不清楚”。胡春浦这个人确实机灵过人，几句话实际上在向我递点子：事情出在李荫枫身上，我们之间没有牵扯；暗意明传，我已心领神会。漆胖子立即阻止：“不说，到重庆去讲”。车到了凤凰